

前 言

0.1

选题背景及研究方法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开始，我国各地区之间（特别是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许多学者纷纷将注意力转到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来。他们或者考察我国地区差距的现状及其变化轨迹，或者对我国地区差距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原因提出自己的看法。然而，由于他们考察问题的视角不同，所运用的分析方法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最终得出的结论也是大相径庭。如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地区差距在扩大，有的学者则认为没有扩大反而在缩小；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地区差距已越过警戒线，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地区差距扩大是发展经济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等等。不同学者认识上的这种分歧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因为作为一名从小在内地农村长大，如今却在大都市生活和工作的知识分子，亲身经历早已告诉我地区差距是一个“客观事实”，尽管对于“目前我国地区差距是否严重”这类问题不同的学者可能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但对于“我国的地区差距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这类问题是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大家都能认同的“说法”的。为什么不

同的学者对于我国地区差距的变化轨迹也存在不同的认识呢？考虑到对我国地区差距的变化轨迹认识不同，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成败得失的评价也就会不同，而这又将直接影响到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从而对未来我国的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开始感到了这一分歧的严重性。可以说，正是出于对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关心和作为一名共和国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对祖国、对社会的责任感，促使我开始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区差距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

地区差距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大凡各地区之间只要在某一个方面，如资源禀赋、人口素质、教育水平、科技水平、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经济效益、市场发育、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或消费水平、经济发展速度等，存在着某种差异，都可以认为存在着地区差距。然而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在上述各种差距中除自然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完全由自然力所决定外，其他各种差距相互之间均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又处在核心的位置。有鉴于此，本书将“地区差距”界定为“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并相应地简称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乃至“地区差距”。

本书的中心议题正是要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问题，包括差距的变化轨迹、差距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历史渊源、差距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为缓解业已存在的差距应采取何种对策等等，作一个系统地分析和研究。

区域经济研究不同于一般经济问题的研究。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特别是地区差距问题）不仅要回答诸如“目前的地区差距是多少”、“地区差距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地区差距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等仅限于表述经济现象的原因和结果以及各经济现象之间关系的问题，而且还必须回答“目前的地区差距是否已较为严重”、“未来地区差距将如何发展”、“过去的区域经济发

展战略存在哪些问题”、“今后应选择何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等涉及伦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问题。有鉴于此，本书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采取了统计分析 with 理论分析并重、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力求将规范分析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如对建国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成败得失之评价，笔者就尽量以各个时期所取得的区域经济发展成就或存在的问题，以及地区差距变化轨迹的实证分析结论为依据；在回答诸如目前我国的地区差距是否已较为严重之类的问题时，笔者也尽量先进行广泛的国际对比，看看我国的地区差距与世界各国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尤其是地区差距过大的某些负面效应在我国是否已经出现，然后再作结论。总之，笔者之所以要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渗透到对我国地区差距问题的系统研究中去，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可能地减少价值判断的主观片面性，相应提高分析结论的可靠性。

0.2

研究思路及各章节主要内容

本书的研究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展开的：首先考察我国地区差距的变动格局，并对我国地区差距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原因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然后是在系统分析影响我国地区差距走势的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基础上对我国地区差距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基本判断，最后以上述实证考察结论和理论分析为前提，对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特别是如何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最终缩小中西部同东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沿着这一思路，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

第 1 章：我国地区差距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鉴于当前学术界在对我国地区差距变动格局的看法上存在严重的分歧，

笔者对我国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选择了直接从剖析他们产生分歧的原因入手。经考察，笔者发现分歧的产生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不不少的学者在考察我国的地区差距时都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即仅仅考察了某一级地域单元上的地区差距，并将其变化轨迹直接等同于我国地区差距的变化轨迹；二是不同的学者在评价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时所采用的方法不尽一致，如有的采用单一指标法（如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人均 GDP 等），有的采用综合指标体系法；三是不同的学者在考察我国地区差距的变化轨迹时采用了不同的统计指标，如有的用绝对差距指标，有的用相对差距指标。而他们各自却极少对自己为什么这样做给予充分的说明和解释。

考虑到这些方法论问题尽管在统计界早已不是“问题”，但在区域经济学界仍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而只要人们对这些方法论未达成共识，类似的不必要的争论还有可能持续下去，在这一章的最后两节，笔者对目前用于评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各种方法及测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各种指标重新进行了筛选。经多方面的权衡和比较，笔者认为评价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最佳方法是采用人均 GDP 法，在缺乏人均 GDP 统计资料的年份（主要是改革开放前），也可以采用人均国民收入代替；而测度我们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则最好采用变异系数（即标准差系数）、Theil 熵和 Gini 系数等综合性的相对差距指标。

第 2 章：对我国地区差距变动格局的再考察。为使人们对我国地区差距的现状及其历史变化轨迹有一个统一而且客观的认识，在这一章，笔者采用人均 GDP 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必要时辅之以人均国民收入等其他指标），以变异系数为主（必要时辅之以极值比率、Theil 熵和 Gini 系数等其他指标），对建国以来我国各级地域单元上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变

化轨迹重新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表明，我国的地区差距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1) 从建国初期到现在，我国各种地域单元上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没有一个呈“正 U”型变化。相反，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之间的差距，以及东部地带内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之间的差距基本呈“倒 U”型变化。其中，20 世纪 70 年代末是它们共同的转折点（最高点）。

(2) 目前我国地区差距拉大的趋势主要反映在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差距上。其中，又以沿海（东部）和内地（中西部）之间的差距拉大趋势更明显。但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差距扩大并不是始于改革开放以来，而是在这之前就已出现了。

(3) 由于自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而与此同时东部和中部地带内的差距却一直在缩小，这种一升一降的变化已使得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之间的差距和各地带内的差距在全国地区总差距中的相对重要性在 1992 年出现了逆转，亦即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之间的差距现已占到地区总差距的 50% 以上。

(4) 我国各省份内部的地区差距同样不容忽视。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各级地方政府（尤其省级政府）正确地制订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十分重要。

(5) 改革开放以来 8 个民族省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有升有降，其变化轨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 1978—1980 年这一差距首先扩大；然后，在 1980—1992 年间这一差距持续缩小；1992 年以来这一差距又急速扩大。然而，尽管在 1980—1992 年间有长达 12 年的下降历程，但由于两次上升时的速度都较快，总的来说还是扩大了。

(6)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

农民收入差距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但就相同的年份比较，农村居民之间的差距始终大于城镇居民之间的差距。此外，我国还出现了城乡之间的反差距。我们将这种反差距出现的原因主要归咎为地区差距的扩大。

第 3 章：我国地区差距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历史渊源。这一章重点回答我国的地区差距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以及为什么各级地域单元上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表现为不同的变化趋势等这样一些问题。因为只有进一步弄清了这些问题，我们才可以说对我国一个时期以来的地区差距状况有了一个较深入的了解，也才能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使我们在规划未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和探讨相应的区域经济政策时更有针对性，在追求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少走弯路。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尽管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到这方面的研究上来，但由于他们在对我国地区差距的现状及其历史变化轨迹的认识上原本就存在较大的分歧，他们对我国地区差距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原因所作的解释也有许多相互矛盾之处。比如，那些认为我国的地区差距呈“U”型变化（即改革开放前趋于缩小，改革开放以来趋于扩大）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地区均衡布局政策和“三线建设”缩小了我国的地区差距。这些学者的观点就和那些坚持认为我国的地区差距呈“倒 U”型变化的学者的意见相左。类似的分歧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所以，为使人们的认识更趋一致，对我国地区差距发展变化的历史渊源继续做一些深入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考虑到从统计的角度来看，某个时期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向何种方向变化，以及变化幅度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各地区原有的经济基础和在这段时期内的经济发展速度；而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又受到国家政策、市场发育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这一章中，笔者着重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起点、国家政

策对各地区的影响、各地区的工业发展模式、各地区的市场发育水平、各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各地区的人口素质和人口增长速度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地区差距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原因。实证考察结果表明：

(1) 解放前夕我国的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分布极不均衡，东北及东部沿海一带是我国当时经济基础最好的地区，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尤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则极度薄弱。这种经济基础上的悬殊差别，不仅使得建国初期我国就存在悬殊的地区差距，而且对后来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从“一五”计划开始直到改革开放前长达 20 多年的均衡布局政策，主要是“一五”时期的执行效果较为理想，对缩小地区差距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至于“二五”时期和后来长达 10 多年的“三线建设”，虽然把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向中西部大大推进了一步，但由于当时片面追求生产力的均衡布局，加之受国际形势所迫，很多投资项目以“山、散、洞”和“嵌入式”为主要特征，投资效果并不理想，在当时并未使沿海和内地之间，以及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业已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有所缩小（反而有所扩大，注意，很多人并不这样认为）。如果说“三线建设”对于缓解地区差距也做出过一定贡献的话，那么这种贡献仅在于使作为三线建设主战场的中部和西部地带各自内部各省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此期间有所缩小。

(3) 改革开放以后以倾斜发展沿海地区为主要内容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i) 由于资金是我国各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感到短缺的要素，国家投资向沿海地区倾斜的结果，一方面直接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中西部的资金紧张状况。(ii) “渐进式”的对外开放策略使沿海地区在利用外资方面始终占据绝对优势。上述两方面的区域效应最终导致了沿海与内地之

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进一步扩大。(iii) 由于在沿海地区内部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之间,在对外开放的时间、层次、程度,以及所享受的优惠政策的多少上,同样存在着差异,沿海地区内部的“南北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

(4) 1978 年以来“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思路,一方面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少走了许多弯路,避免了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剧变所引起的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步和发展机会的不均等。沿海地区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其各项改革都较内地先行一步,使沿海地区在同一时期内总是较内地享有更多的自主权和优惠政策,沿海地区的市场发育也总是超前一步。这种人为造成的不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使内地的资金、人才和大量廉价劳动力纷纷涌向沿海地区,外资也大量投向沿海地区,最终使沿海经济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而内地经济则因“失血”过多而发展缓慢。这是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加速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

(5) 建国以来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上是沿着“重型化—轻型化—新一轮重型化”的轨迹顺次展开的。然而资料表明,中西部工业发展模式的转换明显滞后于东部,在中西部的工业结构中仍然以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等提供初级产品为主的重型工业所占比重较大。中西部的这种工业结构既妨碍了中西部劳动力成本低等比较优势的发挥,同时对中西部的市场发育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使中西部无论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还是在市场发育水平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方面,都明显不如东部。

(6) 我国始于 1978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我国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显著提高。然而,分地区来看,各地区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并不一

致，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明显高于中部，中部又高于西部。由于一个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越彻底，市场化程度越高，则这个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越高，经济发展越快；而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周围市场发育水平较低地区的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也将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一地区，从而进一步加快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东、中、西部的市场发育不同步，在一定程度上对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持续扩大起了助推器的作用。

(7)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固然与东部地区在优越的区位和国家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吸引了国内外大量的资金、人才和廉价劳动力到这里投资和求发展，在短期内集中投入了大量生产要素有关，但数据表明，另一个原因同样不容忽视，这就是东部地区的经济效益明显好于中西部。正是大量要素的集中投入和对要素充分而有效的利用二者一起，共同促成了东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

(8) 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与各地区人口文化素质的高低和人口增长的快慢也有着直接的联系。统计数据表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其人口的文化素质一般也较高，而人口出生率却较低；相反，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的地区，其人口的文化素质一般也较低，而人口出生率却较高。这一现象提醒人们，人口素质和人口增长速度也是影响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就必须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并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第 4 章：我国地区差距未来发展趋势预测。通过前两章的实证考察，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我国地区差距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其形成的历史渊源有了一个较深入的认识。这里之所以还想对我国地区差距的未来发展趋势做一些推断和预测，主要是因为在前两章的实证考察中，笔者已明显地感到经济体制转轨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是建国以来我国地区差距的变化轨迹是在两

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形成的。尽管从我国地区差距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历史渊源中我们也能吸取到一些指导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实践的有益的经验教训，但其借鉴意义终究是有限的。因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生活的市场化程度只会越来越高，在这种新的体制下，将会有一些新的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逐渐明朗化，我国的地区差距将来究竟如何发展变化，仍然是未知的。而这直接关系到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因此，我们还有必要完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尽管目前我国仍处在向这一体制转轨和过渡的过程中），对我国地区差距的未来发展趋势再做一些展望和预测。本章的写作是这样安排的：首先对西方学者关于市场经济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长期趋势所做的理论分析，以及他们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历史发展轨迹所做的实证分析，做一个概要的评述，并试图从中发掘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然后结合我国的国情预测可能拉大或缩小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相抵后的净效果。

关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国内部的各个地区将以均衡的方式还是非均衡的方式发展，亦即如果因为某种外力（经济的或非经济的）使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出现了不平衡，那么这种不平衡是将在短期内自动得以修复（从而各地区将自动重新回到均衡发展的轨道上来）还是将长期存在下去（从而需要政府的干预才能使各地区重新实现均衡发展），在西方学者中间存在着截然相反两种观点：一是新古典主义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二是以缪尔达尔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赫尔希曼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理论，以及卡尔多的相对效率工资理论为代表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由于新古典主义区域均衡发展理论从假设到结论都不符合各国的实际情况，笔者对这种理论持否定意见；相反，笔

者认为以缪尔达尔、赫尔希曼和卡尔多为代表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则对世界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做出了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仍将是一个非均衡发展过程，为把我国的地区差距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政府干预将是必要的。

在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差距历史发展轨迹所做的所有实证研究中，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实证研究结论是 1965 年美国经济学家 J.C. 威廉姆逊提出的“倒 U”假说。威廉姆逊的“倒 U”假说发表后，许多学者表示同意他的观点，但也有学者持怀疑态度。为此，笔者对各种赞同或批评意见重新做了一下梳理。笔者总的感觉是，尽管某些批评意见粗看上去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们并不能改变“假说”的结论；至于其他一些批评意见，则几乎没有一个是可以站得住脚的。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威廉姆逊的“倒 U”假说基本上成立，可以作为对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差距一般发展趋势的规律性认识来接受。当然，笔者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笔者主张在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尤其在经济发展水平未达到地区差距出现转折之前），我们应该容忍地区差距无限制的扩大，恰恰相反，笔者主要是想提醒人们认识到这一规律的客观存在了，并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这一总要求和大前提出发，对地区差距扩大的势头加以有效地抑制，使各地区之间的差距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

联系我国的实际，笔者认为，当影响我国地区差距走势的各种内在因素在未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将对未来我国各级地域单元上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产生重要的影响，如：（1）市场机制；（2）政府干预；（3）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为此，笔者对这些影响因素进一步做了重点考察。

经考察笔者认为，对市场机制在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不能做简单地理解。相反，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随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日趋深入和各地区的市场发育日渐完善，市场将在各地区的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将大大地提高各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各地区之间在资源、资金、技术、人才以及产品市场等方面的争夺也将日趋激烈，而这种竞争将更有利于具备多方面优势和经济实力的发达地区，从而市场机制也有进一步拉大我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可能。因此，我们既不能因为市场机制是一种较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承认市场机制已经并将进一步导致我国的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一倾向，也不能因为担心市场机制将导致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就终止迄今为止已进行了近 20 年的市场化改革。正确的思维应该是，一方面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对市场机制的某些负面作用（如导致地区差距拉大）始终保持一份清醒的认识，并随时加以纠正。

与此相对应，笔者认为，关于政府将在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以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即一方面政府将通过转变自身的职能，促进市场的发育，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较为宽松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又应通过制定适当的区域政策防止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导致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

总结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奇迹，笔者认为我国经济较落后的地区同样有可能享受到“后发优势”。而一旦我国经济较落后的某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出现跳跃式发展，则必将对我国的地区差距走势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笔者将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也列为未来影响我国地区差距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过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及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具体情况，笔者最后对我国几个主要地域单元上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如下基本判断：（1）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将呈“倒U”型变化，转折点可能出现在2010年前后；（2）东部各省（区、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将持续缩小；（3）全国各省（区、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近期内最有可能处于高度稳定状态，既不显著扩大，也不显著缩小；（4）各省内部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将出现分化，其中，经济较落后省份内部的地区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而经济较发达省份内部的地区差距则有可能转而缩小；（5）民族省区同其他省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扩大的势头将会得到有效的缓解。

第5章：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本章的讨论着重围绕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一是目前我国地区差距是否已较为严重？对于我国地区差距能否听之任之，任其发展？二是如果需要对我国地区差距的未来发展走势加以适当的调控，那么我们又应采取何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为回答第一个问题，本章5.1首先对西方一些地区差距悬殊的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经考察笔者发现，悬殊的地区差距不仅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还在某些国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方国家的这些教训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5.2是对我国和某些西方国家地区差距的一个横向比较，旨在研判我国地区差距的严重程度。通过比较笔者发现，目前我国地区差距不仅显著高于某些发达国家历史上地区差距的最高值，而且也高于像前南斯拉夫、印度等当今地区差距较严重国家的水平，无论从哪个角度比较，我国都已属于世界上地区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地区差距悬殊给西方国家带来的某些负面效应，如地区间的矛盾与摩擦加剧，各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严重脱节，由经济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引致严

重的社会发展不平衡等等，在我国尤其已初露端倪。因此，某些人仅仅从我国没有出现像前南斯拉夫那样尖锐的地区冲突和民族矛盾（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对落后的边远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给予了适当的补偿，我国各地区居民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较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要小得多）这一点出发，不承认我国的地区差距已较为严重，甚至觉得悬殊的地区差距还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这种观点是缺乏依据的，也是有害的。相反，笔者觉得为避免地区差距过大所引发的某些负面效应在我国继续蔓延乃至最终酿成一些不必要的后果，采取适当的措施将我国的地区差距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已显得非常必要。

那么，怎样将我国的地区差距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呢？可以说，目前我国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尽管绝大多数学者和来自不同地区的政府官员都赞成在我国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但各自却对这一战略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因此，怎样将人们的认识统一起来，实施一项真正有利于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章的 5.3 正是试图为这一问题找到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答案。在这一节中，笔者不仅对在我国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还对应该从哪些方面分析一段时期内的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协调，以及如何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等当今困扰我国理论界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判断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协调：一是看是否处理好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二是看是否促进了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三是看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否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四是看区域经济发展是否表现为一种“帕累托改进”。而要实现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当务之急是要加快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

发展，并应注意同时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作用，注意把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有机统一起来。为真正发挥出东部对中西部的带动作用，笔者还特别主张以点轴开发模式取代梯度推移模式。

第 6 章：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若干建议。正如上文已指出的，要实现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当务之急是要加快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其意义还不仅在于此。比如，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对于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势头；对于改善全国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保持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边境安全等等，就不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因如此，笔者对如何促进和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最终缩小中西部与东部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尤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笔者所提的政策建议包括：

- (1) 完善宏观调控措施，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投入力度；
- (2) 改善投资环境，加大中西部招商引资力度；
- (3) 建设中西部运输大通道，培植中西部的增长极和发展轴；
- (4) 充分挖掘三线企业的发展潜力；
- (5) 加快中西部乡镇企业及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 (6) 树立大农业思想，优化中西部农业的内部结构；
- (7) 加强区域间的横向联合与协作，促进中西部产业结构升级；
- (8) 加大扶贫力度，完善扶贫措施，消灭绝对贫困；
- (9) 树立正确的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以上就是本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及主要结论和观点。

0.3

本书的主要创见与不足

与国内同类研究成果相比，本书主要在下列一些方面将我国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了一步：

(1) 规范了研究地区差距的统计方法，并且通过重新考察我国地区差距的变动格局，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

(2) 对我国地区差距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原因做了较深入的分析；

(3) 对西方学者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差距长期发展趋势的各种学说给予了客观的评价；

(4) 对市场和政府在我国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各自将发挥什么作用，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

(5) 对我国地区差距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6) 对未来我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理论上重新进行了诠释；

(7) 对如何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然而，由于地区差距问题涉及面很广，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任何一个因素最终都会对地区差距的走势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要对地区差距的形成和发展变化做出既面面俱到又合情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对地区差距的未来发展走势做出准确无误的预测，不仅受现有资料和个人知识面的限制有一定难度，而且工程量在短时间内也难以做到。正因如此，本书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区差距问题采取了粗线条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分析地区差距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历史渊源，还是预测地区差距的未来发展趋势，都将注意力重点放在可能对地区差距走势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主要因素上，而对其他一些在笔者看来较为次要的因素则采取了一笔带过的处理方式（或者干脆略而不论）。与此相适应，本文在设计未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笔者也没有刻意地追求面面俱到，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需要出发，着重思考和回答当前我国理论界最关心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同样地，在考虑如何加快我国中西部

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时，笔者也尽可能地从中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求政策主张面面俱到，但求每一项建议都有针对性，确实能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其经济发展进程。所以，尽管笔者的初衷是想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区差距问题作一个尽可能全面而且系统的研究，但受现有资料和个人知识面的限制，加之时间仓促不允许面面俱到，最终呈献在大家手中的这份学位论文仍然只能算是对我国地区差距问题的一个粗线条的初步研究成果，某些结论和政策建议甚至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但是我想，正如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过程并且永无止境一样，对我国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也不会例外。只要笔者能够持之以恒，并不断将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和新的知识充实到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去，笔者一定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新成果，为实现我国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和同仁对本书用到的各种分析方法及由此得到的各种结论和政策建议提出宝贵的意见。